

伦敦大学与英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

邓云清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 400715)

摘要:伦敦大学的创立是19世纪英国高等教育改革运动的开端。在功利主义的导引下,伦敦大学对古典绅士教育传统进行必要修正,对大学目标、学科与课程等作出重大调整,全面启动英国高等教育的世俗化、平民化与泛智化进程。

关键词:高等教育;伦敦大学;英国;19世纪

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2614(2008)03-0048-04

19世纪是英国教育全面改革的时代,也是功利主义与保守主义激烈交锋的时代。伦敦大学就诞生于这个时代。伦敦大学以功利主义为导向,取消教派限制,提倡专业教育和科学教育,极大地突破了牛津、剑桥大学的古典绅士教育传统,开启了宗教无甄别、课程讲实用的“新大学运动”,因而成为英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先锋与典范。本文拟对19世纪伦敦大学的创立与发展历程作出交代,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伦敦大学对英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意义。

一、英国高等教育改革趋势的出现

英国是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立较早的国家。自16世纪以来,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英国内战、光荣革命、启蒙运动、产业革命,将英国的资本主义文明不断向前推进。不过,英国早期资本主义文明的主要受益者是资产阶级化的土地贵族和绅士^①。表现在文化教育方面,16~18世纪英国教育特别强调新教伦理与美德,强调绅士品质的培养,强调对英格兰国教会(即圣公会)的虔诚,力图用古典学与基督教人文主义培养贵族精神。这在大学教育中表现尤为明显,土地贵族和绅士的特权正是通过大学教育而加以维护的。

18世纪至19世纪初,英国^②高等教育体系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是牛津、剑桥大学两所古典大学,它们自12~13世纪以来就统治着英国高等教育,此时仍是英国高等教育的核心。在16世纪晚期17世纪早期教育大扩张中,古典大学逐渐形成鲜明的国教主义与贵族主义。国教会成为古典大学的主要开办者,其主导地位在17世纪晚期演变成对非国教徒(清教徒与天主教徒)的歧视与甄别,将非

国教徒从古典大学排斥出去。土地贵族和绅士成为古典大学的主要服务对象,古典大学甚至一度成为贵族和绅士子弟独占的大学。资料显示,1760年牛津大学贵族和绅士子弟占学生人数的比例为83%,1810年这一比例甚至达到99%⁽¹⁾。在课程设置上,古典大学主要教授古典学与新教伦理,注重的是绅士身份与品质的养成,而不是谋职手段的培训,这与平民特别是中等阶层(middling sort)的教育需求相背离,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脱节。英国高等教育体系的第二个部分是以非国教学院与私立学院为组成部分的阿卡德米学院(academy)。由从牛津、剑桥大学排除出去的清教徒与天主教徒开设,主要教授自然科学与职业技术,培养社会实用人才,在科学教育与职业教育方面做了许多古典大学不愿做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古典大学的问题⁽²⁾。不过,就社会声望而言,阿卡德米学院始终处于英国高等教育的第二层次,无学位授予权,规模较小,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对于这些问题,由于受高等教育保守主义的束缚,阿卡德米学院本身似乎难以突破。

突破英国高等教育保守主义的是另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功利主义。18世纪以来,启蒙运动与产业革命相继展开,中小市民与农民的经济实力开始壮大,资产阶级民主正在向下扩散,最终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化为一股追求全面民主、自由、平等的自由主义浪潮。在英国表现为功利主义。功利主义的创始人是边沁(J. Bentham),他提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后称“最大幸福原则”⁽³⁾),力图从根本上清除支撑土地贵族和绅士特权的理论,建立一个符合社会中下层特别是中等阶层的社会改革理论。边沁十分重视教育在造就“最大幸福”方

面的作用,主张教育不分性别、宗教与政治倾向。边沁的教育观为哲学家与政治经济学家詹姆斯·密尔(J. Mill)所发扬。此人强烈抨击贵族和绅士的特权,反对国教会对教育的控制,提倡用中等阶层的标准来培养人才^[4]。功利主义教育观为哲学家与文学家汉密尔顿(W. Hamilton)所吸收,他对大学改革进行更有针对性的设计,在承认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重要性的同时,极力主张设立专业学院、培养实用专业人才^[5]。

在功利主义教育思想的积极引导之下,英格兰出现了高等教育全面改革的趋势。按照高等教育世俗化、平民化、专业化的设想,英格兰高等教育近代化进程终于全面启动。伦敦大学的创立就是其重要成果。

二、伦敦大学的创立

伦敦是英国首都与第一大城市,1801年伦敦人口达到95.8万,占全英格兰人口的11.5%^[6]。伦敦成为中等阶层最集中的城市,是最有财力支持、最有生源基础的地方。以功利主义为指引的新式大学,首先在伦敦创建。1825年,著名诗人坎贝尔(T. Campbell)在《泰晤士报》上发表致国会议员布洛姆(H. Brougham)的公开信,建议在伦敦创办一所对中等阶层的青年子弟实施高等教育的大学,从而拉开了创办新大学的帷幕^[7]。经过两年的筹备,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于1827年4月奠基成立,并于1828年10月正式开学。

关于19世纪20年代伦敦大学的属性,可以从创办者的社会属性与思想倾向加以分析。在伦敦大学的创办过程中,坎贝尔、布洛姆、詹姆斯·密尔、赞查利·麦考莱(Z. Macauley)等人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也是大学委员会的成员,大学委员会还有著名人士如约瑟夫·休谟(J. Hume)、格雷戈里(O. Gregory)、伯克贝克(G. Birkbeck)、格罗特(G. Grote)、图克(W. Tooke)、沃伯顿(H. Warburton)、约翰·拉塞尔(J. Russell)等人。就社会属性而言,伦敦大学的创办者主要有四个部分:一是具有自由思想的法学家和国会议员,如布洛姆、麦考莱、休谟、图克、拉塞尔等人;二是具有自由思想的学者,如坎贝尔、格罗特、密尔;三是具有科学思想的学者,如格雷戈里、伯克贝克;四是代表工商业利益的商人,如沃伯顿。当然,他们多数兼而有之。就思想倾向而言,许多人是边沁主义者。不少人与边沁联系密切,如密尔、休谟等人;而布洛姆、格罗特、图克、沃伯顿则与密尔过从甚密,坦承是边沁主义者。边沁本人年近八十,没有直接参与创建大学的工作,但伦敦大学

学无疑在很多方面实践了边沁的思考,他的教育不分宗教与政治倾向的观点为伦敦大学所采纳。故从思想指导来说,边沁无疑是伦敦大学的灵魂。就宗教倾向而言,许多人具有非英格兰国教背景。如麦考莱曾担任过苏格兰教会牧师,伯克贝克则来自贵格会(清教一教派)家庭^[8]。不难看出,非国教主义与功利主义氛围从一开始就弥漫在伦敦大学决策层。

关于办学原则与目标,在1827年《伦敦大学委员会关于大学性质与目标的声明书》中有明文规定。在批评牛津、剑桥大学宗教限制与昂贵花费的基础上,《声明书》提出伦敦大学办学原则与方向:

因此,鉴于不信奉国教者的人口如此之多,其掌握的财富如此之雄厚,鉴于英格兰人中生活闲适、财富中等的人口比例如此之大,毋庸置疑,我们国家的这些最具潜力成员迫切需要建立这样一个机构。在这个机构,用合理的费用就可以获得教育;在这个机构,所有教派的信徒均无人学资格的限制^[8]。

取消宗教资格限制,降低学费与生活花费,为中等阶层的教育服务,是伦敦大学办学原则与目标。

关于学科与课程,《声明书》在批评牛津、剑桥大学过于偏重神学与古典文学等自由教育的基础上,在批评牛津、剑桥大学疏于医学与法律等专业教育的基础上,提出将专业教育与自由教育相并列,充分利用首都提供的法律与医疗实践与就业机会,展开法律、医学、工程学专业教育。在此基础上,《声明书》提出其课程体系:“这里将安排三类课程,一是构成自由教育的基本课程,二是带有装饰功能的课程,三是属于专业教育的课程。”^[9]《声明书》共列出36门课程。其中,第一类课程有12门,第二类课程有8门,第三类课程有16门。绝大多数课程设教授席。其中,不少课程的教授席是在英国首次设立的,如第一类中的法国语言和文学、英国语言和文学、政治经济学、化学,第二类中的意大利文学、德国和北欧文学、动物学^④。这些新课程要么是现代语言学,要么是新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特别是化学、动物学的设立,将19世纪自然科学的新进展较快地纳入到大学教育之中,对于推动科学教育发展是大有裨益的。《声明书》基于其“宗教无甄别”原则,对其不设神学专业、不开神学课程进行了申辩。就整个课程体系而言,与牛津、剑桥相比,伦敦大学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点或进步因素:一是无宗教课程,二是进行法律、医学、工程等专业教育,三是设置化学、政治经济学等新课程。总体看来,伦敦大学课程的泛智性、实用性与科学因素明显。

通过19世纪20年代伦敦大学办学原则、目标

与课程的分析不难看出,在功利主义的导引之下,伦敦大学在目标、学科与课程等方面作出重大调整,成为一所宗教无甄别、课程实用而“现代”的新式大学,从而在英国高等教育世俗化、平民化、泛智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成为19世纪英国高等教育改革运动的开端。对于伦敦大学创立的意义,青年政论家与历史学家托马斯·麦考莱(T. B. Macauley)在《爱丁堡评论》发文预见道:“新大学……注定将有一个久远、光荣和行善的存在;……它将成为未来院校的典范;甚至那些现在正在蔑视它的院校,也将会在某种程度上感受到它的有益影响。”^[10]

三、新伦敦大学的成立与发展

伦敦大学的原则是“宗教无甄别”。大学刚建立,这种非宗教主义就遭致牛津、剑桥的保守势力与英格兰国教会的激烈反对。在保守势力的支持下,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成立,并于1829年取得政府颁发的特许状,1831年正式开学。这样,就在伦敦出现了两所办学原则截然不同的大学。国王学院按牛津、剑桥的传统,承认英格兰国教会对学院的主导。不过,就培养目标与课程而言,两校并无显著区别,如《国王学院临时章程》规定,学院的任务是培养商业从业人员,或到其他大学攻读学位^[11]。开设课程有神学、数学、植物学、化学、法学、德国文学、法国文学、古典文学、商业原理等^[12]。像化学、德国文学、法国文学、商业原理都属于当时较“现代”的新课程,是伦敦大学率先开设的,国王学院在这方面照搬不误。因此,两校除宗教方面的区别之外,其他方面很相似。不过,两校均无学位授予权,对学生只能颁发毕业证书。政府与各方磋商,最后达成一个合并方案,将两校置于一个新机构之下:两校原有建制不变,只是将1827年成立的伦敦大学改为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与国王学院一样独立办学;新机构称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凌驾于各学院之上,主管各学院的考试与学位授予工作,成为一所联邦制大学^[13]。

1836年11月,政府向新伦敦大学颁发特许状,宣告其正式成立,并于1837年4月组成大学理事会,制定考试计划。新伦敦大学是由政府直接设立的,这与原伦敦大学的私立性质不同。不过,就办学的原则、目标与课程而言,原伦敦大学的基本原则与精神大体保留下来,可以从两个方面略加分析。首先,从大学相关文件来看,均强调世俗主义原则与功利主义精神。1835年6月新伦敦大学合并方案规定:“在伦敦为所有教派的信徒提供授予学位的模

式,没有区别,不强加任何检验或取消资格。”^[14]

1836年11月大学特许状规定:“为了宗教和道德的进步与有用知识的增进,对于一切阶级和教派的我们忠诚的臣民,不加任何区别,鼓励他们接受正规的自由教育。”^[15]其次,从大学考试科目与学位授予专业来看,世俗主义原则与功利主义精神得以贯彻。在上述两份文件中,均对学位授予专业加以规定。1835年6月大学合并方案规定了文学、法学、医学学位,将神学学位排除在外^[16]。1836年11月大学特许状确认了这项规定^[17]。从后来的实际操作来看,有三个专业六种学位:文学士、法学士、医学士、文硕士、法学博士、医学博士。大学不仅进行学位考试,还要求在学位考试前必须进行入学考试。1838年11月第一次入学考试共四科:古典学、数学、自然哲学、任选科目(化学、植物学、动物学)^[18]。四个科目中,理科占多数,这与法国、德国的大学入学考试很相似。实际上,大学理事会在制定考试计划时,认真研究过法国和德国的大学教育。19世纪50年代,第二次科学革命已近尾声,物理学、化学的基本体系建立起来。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加上德、法等国科技竞争的外部压力,迫使伦敦大学进一步提升自然科学在大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1858年,政府颁布特许状,赋予伦敦大学授予科学学位的权利^[19]。伦敦大学建立第四个学部,即理学部,授予理学士与科学博士,自然科学取得了与人文、医学与法学完全同等的地位。从上述两个方面的分析不难看出,新伦敦大学仍具有强烈的世俗性与功利性,科学因素则更见明显。

新伦敦大学的任务是考试和授学位,自己不招生、不授课,是考试机构而不是教学机构。在伦敦及各地成立的学院,在招生、教学、财务、日常管理上均独立自主。在这种新模式下,学位与学历截然分开,伦敦大学掌管学位,各学院掌管教学。这是英国高等教育的一种独特模式。在这种模式下,英格兰各地的大学学院纷纷兴办。到1851年,伦敦大学的普通学院达29所,附属医学院近60所(含苏格兰、爱尔兰等地区的附属学院),形成高等教育大发展的局面^[20]。需要提到的是,在伦敦大学诸学院中,很多学生对学位并无所求,学位获得者在人数上占少数。不过,这一点并没有妨碍高等教育的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宽进严出”的高等教育模式。对于在学位方面有高标准的英国来说,这种模式不失为高等教育平民化的一种有效模式。

四、新大学运动:伦敦大学理念的延伸

伦敦大学的基本理念是功利主义和世俗主义。

伦敦大学的创立及其后的创新与发展,不仅是19世纪英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成果,而且是功利主义和世俗主义在英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成功实践。以伦敦大学为典范,功利主义和世俗主义不断向全国各地延伸,对整个英国高等教育产生重大影响。

以伦敦大学世俗主义原则和功利主义精神为基本理念,自19世纪50年代早期起,一大批新式大学(初为college学院)在英格兰地方各重要城市兴起,史称“新大学运动”。这些新式城市学院均以宗教无甄别、课程讲实用为基本原则,以培养科技人才为主要目标。其中,有11所成长较快,并在20世纪成为完全大学。著名的有曼彻斯特欧文斯学院、利兹约克郡科学学院、利物浦大学学院与伯明翰梅森科学学院^[21]。作为一种新式高校,城市学院大力推行职业教育与科技教育,将伦敦大学的世俗主义原则与功利主义精神带到英格兰地方各重要城市。

伦敦大学和城市学院世俗主义和功利主义教育的成功,对古典大学形成巨大的压力。英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浪潮终于冲决古典大学保守主义的防线。自19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晚期,英国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大学改革的法令,对牛津、剑桥大学进行重大改革^[22]。这些改革不仅废除了古典大学在入学与学位授予方面的宗教检验(神学专业除外),彻底取消了宗教甄别,实现了宗教与教育的分离;而且大力发展实用学科特别是自然科学和历史学科,使之取得了与古典学科和数学同等的地位。这样,伦敦大学的世俗主义原则和功利主义精神延伸到古典大学之中。

总之,到19世纪末,牛津、剑桥两所古典大学,以及曼彻斯特、伯明翰等城市学院,都具有了现代大学的基本特征,既是世俗主义、平民主义的高校,又是课程实用、具备泛智特点的高校。经过长期努力,伦敦大学开启的新大学运动基本实现了英国高等教育的世俗化、平民化与泛智化,伦敦大学的理念最终延伸到整个英国高等教育体系之中。

注释:

①如无特别说明,本文“土地贵族和绅士”皆指资产阶级的土地贵族和绅士。

②如无特别说明,本文“英国”皆指英格兰。

③本段人物的背景资料,参见英文维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相关人物词条(按英文姓名检索)。

④本段伦敦大学首置教授席的资料,见于英文维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University of London”词条。

参考文献:

- [1] J. A. Sharpe. *Early Modern England: a Social History, 1550—1760* [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87. 258.
- [2] 邓云清. 阿卡德米学院运动与英国近代泛智教育的发展[J]. 高等教育研究, 2005, (8): 91~92.
- [3] [英]边沁. 时殷弘,译. 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57.
- [4] James Bowen. *A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 [M]. vol. 3.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81. 288~289.
- [5] J. P. Powell. *Some Nineteenth-Century Views on the University Curriculum* [J].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1965, (2): 103.
- [6] Peter Clark. *The Cambridge Urban History of Britain* [M]. vol. 2.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473.
- [7][13][14][15][16][17][18][19] N. B. Harte.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1836—1986: an Illustrated History* [M]. London & Atlantic Highlands: The Athlone Press, 1986. 61~63, 72~73, 72~73, 80, 73, 92~93, 92, 107.
- [8][9] A. Aspinall & E. Anthony Smith.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M]. vol. 8.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697, 699.
- [10][11][12] 王承绪. 伦敦大学[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5. 23~24, 29~30, 31.
- [20][21] Edward Royle. *Modern Britain: a Social History, 1750—1997* [M]. London: Arnold, 1997. 381 - 382, 382 - 388.
- [22] Willis Rudy. *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1100—1914* [M]. London: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 1984. 116.

University of London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England

DENG Yun - qi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University of London commenced the reformation movement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19th-century England. With direction of utilitarianism, University of London modified the classical gentleman education on purpose, subject and curriculum, which advanced the secular, plebeian and pansophia education.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 England; 19th-century

[责任编辑:杜小平]